

湘軍

1

專著 綜述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湘軍

1

專著
綜述

朱漢民 丁平一 主編
劉泱泱 王興國 點校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湘軍：全10卷/朱漢民，丁平一主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12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ISBN 978-7-5097-4618-9

ISBN 978-7-5097-4618-9



9 787509 746189 >

I. ①湘… II. ①朱…②丁… III. ①湘軍—史料
IV. ①E29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3) 第 098688 號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湘軍·第一卷



主編 / 朱漢民 丁平
顧問 / 劉泱泱
點校 / 劉泱泱 王興國

出版人 / 謝壽光

出版者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區北三環中路甲 29 號院 3 號樓華龍大廈

郵政編碼 / 100029

責任部門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電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項目統籌 / 宋月華 范迎

經銷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市場營銷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讀者服務 / 讀者服務中心 (010) 59367028

責任編輯 / 范明禮

責任校對 / 劉芙蓉

責任印製 / 岳陽

印裝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開本 / 787mm×1092mm 1/16

版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 ISBN 978-7-5097-4618-9

定價 / 9800.00 圓 (全十卷)

本卷印張 / 46.75

本卷字數 / 996 千字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裝訂錯誤，請與本社讀者服務中心聯繫更換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出版委員會

(按姓氏筆畫排序)

于 沛

成崇德

朱誠如

李文海

孟 超

徐兆仁

陳 樺

馬大正

鄒愛蓮

戴 逸

總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誌性文化工程。

清代爲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爲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跡。故史料爲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陞爲理性之認識，才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爲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爲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爲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爲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

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瞭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燬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鉅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崑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庋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鈔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庋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灣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沈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

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鈔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誌、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鈔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燬，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穫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携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吁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眾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為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為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鉅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

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爲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霑溉將來，是所願也。

湘軍與晚清中國

——“文獻叢刊”《湘軍》總序

朱漢民

湘軍原本是清朝咸豐年間在湖南地區創建的一支地方武裝，但是，它的興起與發展，逐漸演化成晚清中國一個驚人的歷史事件和重大的歷史現象。湘軍的歷史與晚清中國的歷史息息相關，湘軍的出現，完全改變了晚清中國的政治生態、社會格局，深刻地影響了晚清中國的歷史。所以，湘軍之史是清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湘軍在晚清中國歷史上究竟做出了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來？我們首先需要回顧一下湘軍興起的那個時代。湘軍從組建到發展壯大，再到逐漸衰落瓦解，正是清王朝從衰落走向消亡的所謂晚清時期。這個時期的中國，社會矛盾愈來愈尖銳，民族危機愈來愈深重，歷史的車輪駛進了由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階段。

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代王朝。在經歷了康乾盛世之後，清中期的國勢開始走向衰落，吏治日益腐敗，官吏貪風炙盛，營私舞弊，賄賂公行。道光時詩人張際亮曾對當時吏治的敗壞有深刻的揭露：“爲大府者，見黃金則喜；爲縣令者，嚴刑非法，以搜括邑之錢米，易金賄大府，以博其一喜。至於大饑，人幾相食之後，猶藉口徵糧，借名採買。驅迫婦女逃竄山谷，數日夜不敢歸里門，歸而雞豚牛犬一空矣。歸未數日，胥差又至矣，門丁又至矣，必罄其家產而後已。”^① 如此苛索，必然加劇社會矛盾的激化。人民生活每況愈下，反抗鬥爭此起彼伏。白蓮教大起義，遍及五省，延綿近十年。天理教起義，也波及清朝統治的腹地地帶河南、山東、河北等省。爲了撲滅這些起義

^① 張際亮：《答黃樹齋鴻臚書》，《思伯子堂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的熊熊烈火，清王朝幾乎耗盡了全部元氣。備受打擊的大清王朝，已經到了“日之將夕，悲風驟至”^①的地步，日漸顯露出“老大帝國”的“衰世”景象。但統治階層並沒有重新振起，也根本無力挽回國力日衰的頹勢。貴族官僚愈來愈昏聩，行政效率愈來愈低下。鴉片戰爭時，以道光皇帝為首的朝廷惶恐無策，地方要員也多敷衍應付。甚至有的地方已經遍地狼煙，官員也不敢據實上報。大官僚曾望顏曾分析太平天國興起的原因：“其故總由歷年不辦會匪，不拿真賊，一味諱飾，遂致賊腥日肆，匪黨日多。”等到一朝驚醒，早已“蔓延鄰省，禍及天下”^②。這在客觀上也給後來太平天國運動的發展和湘軍的興起提供了有利條件。

到十九世紀中葉，清王朝的內憂外患一時俱來。連年的戰亂與災荒、巨額的軍費和賠款、日趨集中的土地兼併，把農民逼入饑餓與死亡的困境。種種複雜的矛盾不斷積累、日趨激化，終於釀成了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使清王朝面臨改朝換代的危局。面對太平天國的蓬勃發展，清朝政府很難組織軍隊進行有效的鎮壓行動。因為晚清的正規軍隊無論是八旗還是綠營，都日漸腐化，武備廢弛，營制落後，軍官不理營務，士卒不勤操練，早已喪失了清初橫掃大江南北的鐵蹄雄風。京城的八旗兵“三五成群，手提鳥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聚賭博，問其名色，則皆為巡城披甲，而實未曾當班，不過僱人頂替，點綴了事”。外省軍隊，甚至騎兵沒有馬，水勇不習水，武器生鏽，炮台失修，到了操演檢閱的時候，騎兵臨時僱用馬匹，水勇僱用漁民冒名頂替。這樣的軍隊，根本就沒有戰鬥力。太平軍攻克武昌之後，順流直下，一日千里，而清廷的正規軍大多一觸即潰，望風披靡。不過三年功夫，東南半壁江山，都在太平軍的掌握之中。正規經制軍不斷丟城棄地，清王朝處於“四顧無人”的危局之中，這才不得已而放手重用曾國藩及其湘軍集團。湘軍正是在此種艱難險阻的歷史背景下，為了鎮壓太平天國而組建，並逐漸從一支最初頗受輕視的地方團練武裝，發展成為拱衛清王朝的中流砥柱。

就在清朝國勢日漸衰微的時候，英國、法國、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却在迅速崛起，並先後完成了工業革命。歐美資本主義的發展始終伴隨着暴力和掠奪。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推動資產階級不斷地尋找新的商品銷售市場和原料供應地，不斷地開拓更為廣闊的殖民地。因為“資本主義如果不經常擴大其統治範圍，如果不開發新的地方並把非資本主義的古老國家捲入世界經濟的漩渦之中，它就不能存在和發展”。^③而幅員遼闊、物產豐富、人口眾多的中國，自然也就成為他們殖民擴張的目標。西方資本主義的殖民擴張，使中國面臨一場空前的挑戰和危機。在正常貿易不能滿足殖民者擴張欲望，而非法的鴉片貿易又遭到中國正義官僚和有識之士強力抵制的時候，

① 龔自珍：《己亥雜詩》，《龔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509。

② 金毓黻：《太平天國史料》，中華書局，1959，頁500。

③ 《列寧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6，頁545。

1840年，英國軍隊以戰艦和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國門，也轟塌了清朝的經濟、政治、外交、文化等領域的長城。清政府被迫與之訂立城下之盟，簽訂了屈辱的《南京條約》。這一事件，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從此之後，外國侵略勢力紛至沓來。法國在中越邊境挑起戰事，俄國在北方虎視眈眈，鯨吞蠶食中國大片領土；英國在西南對西藏早有覬覦之心；日本在東方急欲與中國一戰。環顧四鄰，清王朝已經強敵壓境，危如累卵。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北京條約》《中法新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一場場失敗的戰爭、一次次屈辱的不平等條約，把中華民族逐漸推向了亡國滅種的邊緣。民族矛盾日漸成為晚清中國最主要矛盾，閉關自守的封建中國，日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鎮壓了太平天國之後，湘軍並未完成其歷史使命。無論是西北沙漠，還是東南海疆，在抵抗西方列強侵略的戰場上，湘軍以及與湘軍有深刻淵源的淮軍，都起到了主力軍的作用，演奏了一曲曲或令人振奮或讓人扼腕的慷慨之歌。

湘軍所處的晚清時代，中國社會開始了艱難的全面轉型。滿洲貴族已經無法控制局勢，以湘軍集團為代表的漢族地主政治集團的勢力不斷上升；中國逐漸被捲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市場體系，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已經無法維繫；落後的手工業已經無法滿足戰爭與生產的需要，西方的先進技術與自然科學開始受到各個階層不同程度的接受和重視，近代理工業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開始起步；舊有的軍隊和營制根本無法承擔國家防衛的重任，開始向近代新式軍隊蛻變；進步的士大夫階層不再堅守“夷夏之防”，開始“睜眼看世界”，並邁出了向西方學習的艱難步履。總之，晚清中國開始逐漸融入整個世界，開始從傳統社會轉向近代社會。所有這些正是湘軍集團活動的歷史舞台和背景。晚清中國內外交困的雙重危局，給湘軍的興起和發展提供了機遇和挑戰。

二

湘軍原來只是一支地方性的團練，但正是這支初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地方武裝，却做出了一系列驚天動地的大事情，在中國近代史上各個領域中均產生了具有重大意義的深刻影響，在晚清即將閉幕的歷史舞台上，唱響了“中興”的序曲。湘軍通過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不僅挽救了即將崩潰的清王朝，還使自己成為國家的主力軍隊。在反抗西方國家侵略的戰場上，湘軍也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抵抗，對收復新疆以保衛中華領土完整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湘軍對晚清軍事制度的變革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湘軍軍制在一段時期內佔據清代軍事制度的核心地位，並且成為傳統兵制過渡到近代兵制的中介。湘軍領袖因積極推動近代化的洋務運動，進而使得民族工商業得以起步發展，為中國近代化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

湘軍在晚清所做出的最令人矚目的歷史事件，就在於成功鎮壓了太平天國，使清

朝暫時擺脫了改朝換代的危局。太平軍金田起義之後，只有兩年多的時間，就從廣西打到了江蘇，定都天京，建立起了與清朝分庭抗禮的政權，幾乎將大清帝國腰斬為兩段。為了鎮壓太平天國，咸豐皇帝命各地在籍官員興辦團練，以輔助、配合正規軍的行動。曾國藩以丁憂在籍侍郎的身份墨經從戎，建成水陸兩師共一萬七千餘人的武裝，並於咸豐四年（1854）正月發表著名的《討粵匪檄》，從湖南衡陽出師，從此踏上了與太平軍長達十多年殊死較量的征程。

清軍與太平軍的戰爭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戰場，一是以太平天國首都天京為中心的東戰場；二是在山東、直隸境內堵禦太平軍北伐的北戰場；三是以武漢為中心，爭奪兩湖、江西的西戰場。戰爭初期三個戰場的清軍主力部隊都是八旗與綠營軍，新建成的湘軍在清軍與太平軍的戰爭全局中，不過是一支“偏師”，並沒有特別重要的地位。但隨着戰事的發展，八旗、綠營越來越弱，而湘軍越來越強，逐漸取代了八旗、綠營的主力軍地位。湘軍在與太平軍的戰爭中，屢敗屢戰，卻又越戰越強。曾國藩出師不利，初戰即有靖港之敗，他羞怒交加，欲投水自盡，被隨從救起。幸而有湘軍主力在湘潭取勝，挽回顏面，也正是湘潭一戰，湘軍開始引起朝廷的注意和重視。經過半年的反復爭奪，湘軍迫使太平軍退出湖南，並乘勢攻下武漢，奪回湖北全省，又在江西戰場獲得較大進展。此後湘軍以湖南、湖北兩省為後方基地，順江而下，漸次奪取湖口、九江。在爭奪九江的戰役中，湘軍又一度大敗，連曾國藩的坐船也被太平軍奪去，全軍損失慘重，曾國藩痛心疾首，第二次欲投水自盡，又為幕客所救。九江之敗，湘軍遭遇重大挫折，進入與太平軍的相持階段。在東戰場，1856年上半年，太平軍連破由八旗與綠營軍構築的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就在形勢朝着有利於太平天國的方向發展之時，太平天國領導集團公開分裂、內訌，天京變亂，元氣大傷，形勢急轉直下。湘軍獲得了重振旗鼓的時機，利用兩湖後方根據地的人、財、物支持，戰鬥力迅速恢復。1860年，幾路湘軍擺開陣式，加緊圍攻對於太平天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安慶。正在此時，江南大營徹底覆滅，八旗與綠營完全無力鎮壓太平軍，清廷轉而全面依靠湘軍，放棄了對湘軍的限制政策，實授曾國藩兩江總督，加欽差大臣銜。不久，通過政變掌握大權的慈禧太后又授權曾國藩節制四省軍務，湘軍其他重要將領也紛紛獲得地方軍政大權。清廷已把鎮壓太平天國、挽救王朝危亡的希望全部寄託在湘軍身上。湘軍開始在對太平軍的各個戰場上發揮主力軍的作用。

1861年9月，湘軍攻克安慶。從此，太平天國在長江上游的重鎮全部丟失，天京已無屏障。1862年曾國藩完成了其“分兵四路，合圍南京”的戰略部署：以曾國荃統率湘軍主力“吉字營”從正面攻打南京；遣左宗棠率領另一支湘軍肅清浙江全境；派李鴻章募建淮軍，進駐上海，攻取蘇南一帶；而命彭玉麟、楊載福統領水師順江直下，全面封鎖長江下游水域，形成了對天京的戰略包圍。兩年之後，這一戰略部署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1864年7月19日，曾國荃部通過開挖地道，填埋炸藥，轟塌城牆，攻下天京。建都於此十一年的太平天國宣告失敗。天京陷落以後，李秀成帶着幼天王出

逃，不久被捕處死。此後，湘軍繼續在福建和廣東等地追剿太平軍餘部。到 1866 年 2 月，這場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被徹底剿滅，湘軍奪得了鎮壓太平天國的“全功”。

正當的湘軍與太平軍激戰的時候，捻軍在中國北方獲得了很大發展，對清王朝構成了嚴重的威脅。自從僧格林沁軍被捻軍全殲之後，滿洲貴族失去了在政治上、軍事上與湘軍集團抗衡的最後砝碼。鎮壓捻軍的重任只能依靠湘、淮軍來完成，這也是湘軍平定太平天國之後的首要任務。曾國藩、左宗棠、曾國荃、鮑超、楊載福、劉蓉等湘軍將帥都曾在剿捻的戰場上奔走殺伐，與李鴻章所率領的淮軍共同把捻軍徹底鎮壓了下去。曾國藩根據“練有定之兵，制無定之賊”的方針，確定了剿捻的河防戰略。儘管曾國藩後來因戰事不利而被調回兩江總督本任，但他所確定的河防戰略却為接替他擔任欽差大臣的李鴻章所堅持，並最終得到了實現。張宗禹所率的西捻軍最後被逼入西阻運河、北阻減河、南阻黃河、東臨大海的絕境之中，被湘、淮軍層層包圍，同治七年（1868）六月，徹底失敗於山東茌平。與東捻軍一樣，西捻軍也是敗於曾國藩所制定、李鴻章所堅持的河防戰略。

與鎮壓捻軍同時及以後數年之中，在雲南、貴州、陝西、甘肅等省，湘軍還平定了苗族、回族等少數民族起義。這一系列的戰爭，情況較為複雜，跨越數省，長達十年，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左宗棠所部湘軍攻入肅州，回民起義被鎮壓，才大體結束。

（二）抵抗外國侵略的戰爭

隨着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束和太平天國的覆亡，清王朝經歷了一段短暫的相對穩定時期，然而，進入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形勢又頓時緊張起來。俄國侵吞中國領土，法國、日本等國都先後掀起了侵略中國的戰爭。在抗擊外國侵略的戰場上，湘軍也立下了不朽的功勳，但是也留下了一層悲壯的色彩。

1871 年，沙俄出兵強佔伊犁，揚言“伊犁永歸俄轄”。與此同時，日本侵略我國台灣，東南海防出現嚴重危機。李鴻章認為“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主張放棄新疆，“移西餉以助海防”。時任甘陝總督的左宗棠則力主規復新疆，主張“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清廷接受左的意見，任命其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1876 年，接近古稀之年的左宗棠臨危受命，督率西征大軍分三路挺進新疆，西征軍的主力則是湘軍驍將、湖南湘鄉人劉錦棠率領的老湘軍二萬餘人。經過血戰，1878 年 1 月左宗棠就收復了除伊犁地區以外的新疆全部領土。在左宗棠、劉錦棠強大的軍事支持下，曾紀澤在談判桌上維護了中國的利益，簽訂《伊犁條約》，從沙俄手中索還了一部分領土和權益。清廷在收復伊犁後，於 1884 年在新疆建立行省，設置州縣，新疆從此納入清王朝的直接統治之下，而新疆行省的第一任巡撫便是劉錦棠。左宗棠與湘軍創造了收復新疆的偉大功業，對於保持國家領土的完整和多民族國家的團結與統一，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法國也在西南邊境和東南沿海及台灣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1885年，法國佔領中越邊境的鎮南關，廣西門戶洞然打開。湘軍王德榜部參與馮子材指揮的鎮南關大捷，扭轉了整個中法戰局，並導致了法國茹費理內閣的倒台。台灣島是中法戰爭的另一個戰場，而湘軍是這個戰場上抗擊侵略者的主力軍。時在福州前線佈置戰事的左宗棠，在沒有輪船運輸、沒有海軍護衛的條件下，派王詩正率三營親軍乘漁船渡海援台。孫開華、楊載福等湘軍老將也都先後奉命率部赴台，抗擊法軍，取得重大勝利。曾國藩胞弟、南洋大臣曾國荃也抽調五艘戰艦援台。淮系將領劉銘傳在台灣抗法，所率部隊亦多湘軍。

1894年日本挑起戰爭，淮系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光緒皇帝因淮軍屢敗，決定動用湘軍這支王牌主力部隊，於1895年1月任命湘軍名將、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劉坤一為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率六萬湘軍開赴遼東，駐紮在山海關內外。這是中日開戰以來清廷規模最大的一次出兵，也是光緒皇帝的最後一次孤注一擲。劉坤一是繼曾、左等元老之後湘軍晚期的重要統帥，號稱“砥柱東南”，素有常勝將軍的美譽。但是，到了抵抗日本侵略的遼東戰場，湘軍已成“強弩之末”，抵擋不住日寇的鐵蹄，在山海關外的牛莊、營口、田莊台等地連遭失敗，幾乎全綫瓦解。曾任湖南巡撫的吳大澂率領三萬湘軍將兵出關收復海城，不幸也遭兵敗。中國戰敗割台之後，留在台灣島上的湘軍將士與台灣民眾一起抵抗日軍，讓日本軍隊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湘軍將士在台灣戰鬥，為保衛台灣、保衛祖國，寫下了湘軍歷史上可歌可泣的最後一頁。

（三）開創洋務運動的先河

繼湘軍成功鎮壓太平天國，成為清軍鎮壓內部反抗和外來侵略的主力部隊，湘軍集團掌握全國大部分行省的地方政權，並對中央政府的決策產生重要影響之後，湘軍集團所取得的第三項巨大成就，即開創了中國洋務運動的先河，並成為整個中國現代化運動的濫觴。

洋務運動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初始階段，其向西方學習的思想淵源，是魏源、林則徐等經世派提出的“師夷之長技”。而曾國藩、左宗棠等湘軍將帥們則繼承、發揚了這種經世致用的思想，並最早把這種思想落實到實踐層面上。洋務運動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括製造槍炮船艦、興辦工礦企業、設立新式學堂、編練新式軍隊、翻譯西方書籍、建立洋務機構、派遣留學生，等等。而湘軍集團在這些領域大多具有開創之功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這場由湘軍發軔的洋務運動，在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以“自強”為主，為適應戰爭和軍事的需要，重點在於訓練、裝備軍隊，以興辦軍事工業為主。七八十年代進而提出“求富”的主張，強調興辦民用工業。民用工業的興辦，促成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產生和初步發展，這對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

曾國藩與其他湘軍人物在洋務運動時期，創辦新式學堂，引進近代自然科學與技術，派遣留學生等，還推進了傳統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興辦洋務，必須有

通曉洋務的人才，而傳統的舊式教育體制和教育內容，都無法滿足這種需要，因而興辦新式學堂，培養洋務人才，又成湘軍洋務的一項重要內容。左宗棠創辦的福州船政局就設立了船政學堂（又名求是堂藝局），以培養造船和駕船人員為目的。又因引進西方科技的需要，各個洋務機構開始設立館局，翻譯西書，如江南製造局就設立了廣方言館。曾國藩還認識到對於西方的先進技術，“苟非遍覽久習，則本源無由洞徹，而曲折無以自明”。在容闈的建議下，曾國藩奏請清廷選派幼童出洋留學，從而開闢了一條國人認識世界、走向世界的新道路。這也是湘軍重要的歷史功績之一。

由此可見，因曾國藩等湘軍領袖宣導的自強而開創的洋務運動，從創辦軍用企業到發展民用企業，從僱用洋人船艦與技術人員到開辦學堂培養專門人才，由翻譯出版西方書籍到派遣留學生，將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從軍事工業到民用工業，又從工業到科學技術，再到文化教育的層面，不斷地推向深入。這一層層深入、向上發展的過程，體現了當時先進的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在不斷地走向深入，也清楚地描繪出中國現代化初始階段的發展軌跡。

三

湘軍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在歷史上造成那麼大的影響，自有其內在的原因。湘軍不能被簡單地視為一支普通的軍隊，它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集團：既是軍事集團，又是政治集團，同時還是一個文化集團。作為軍事集團，湘軍有較八旗與綠營軍更為優越之組織和顯赫之戰功；作為政治集團，其主要將帥掌握了全國大部分地方的軍政與經濟實權；作為文化集團，湘軍執著於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和思想信仰，形成了一道蔚然可觀的歷史人文風景。

（一）作為軍事集團

湘軍首先是一個軍事集團。作為軍事集團，所有湘軍部隊雖無統一的旗幟番號，也無統一的指揮系統，但每一支湘軍的內部却都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共通之處，它們的建軍制度與八旗、綠營完全不同。各支湘軍雖然彼此不相統屬，但有着共同的軍事目標、相同的兵營典制和相似的文化背景，從不以鄰為壑，各自為戰，在戰略戰術上都能遙相呼應，互為犄角，合力對敵。所以，各支湘軍能夠在曾國藩的號召之下，組裝成一部互動的軍事機器。這部軍事機器在建軍營制、訓練方法、後勤系統、戰略戰術等方面，都遠勝於八旗、綠營軍。這就決定了湘軍能夠取代八旗、綠營，成為清軍的主力。

曾國藩作為湘軍集團的第一號人物，儘管沒有直接掌握所有湘軍部隊，但他就像一面精神旗幟，起着凝聚湘軍集團關係的特殊作用。曾國藩不僅在湘軍制度上“改弦更張”，拋棄綠營舊制，在選將募勇方面也強調“掃除陳跡”“赤地立新”，要求“須儘募新勇，不雜一兵，不濫收一弁”。他選擇“忠義血性”“才堪治民”“耐受辛苦”之人作為營官，又使營官負責招募營勇。他對招募勇丁提出了具體的要求：“須擇技藝

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民土氣者爲上；其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受用。”^①這就使湘軍在制度上和兵源上與經制軍完全不同，從而能夠擺脫八旗和綠營的種種弊端，把湘軍建設成一支自成系統的由士紳統帶的，以樸實山民爲勇丁的新型軍隊。湘軍的組建過程，“先擇將而後募勇，有將領而後有營官，有營官而後有百長（即哨官），有百長而後有什長，有什長而後有散勇”，擇將募勇堅持同省同縣的地域原則，鼓勵父子兄弟師友親朋一同入伍，甚至同在一營，以血緣、地域關係和感情友誼作爲連結全軍的紐帶，將領、營官、哨官、什長、散勇之間都是同鄉、師生、親戚、朋友關係，彼此之間“相習有素，能知其性情才力之短長”，在戰場上更能彼此照應，互相救助，使湘軍融爲一個固結的團體。

湘軍作爲軍事集團，其強大的戰鬥力和凝聚力還得益於頗具創新性的“訓練”，把思想教育和軍事訓練有機結合在一起。曾國藩自稱是“訓練之才，非戰陣之才”，他認爲“訓”與“練”各有內涵，不能混淆。事實上，湘軍的“訓”就是對部隊進行以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爲主要內容的思想教育和紀律約束，曾國藩稱之爲“訓家規”“訓營規”，他曾“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復開說至千百語”，“每次與諸弁兵進說至一時數刻之久”^②。曾國藩對“練”也非常重視，熱衷於教練弁勇各種戰鬥技擊、槍法和陣式，對軍中利器劈山炮的射擊技術，尤其加意講求。同時，曾國藩還強調軍紀，制定營規七條，頒佈禁令七條，使弁勇在高度緊張的生活中，養成節奏快，動作齊、能吃苦、守紀律的習慣，有效地提高了湘軍的戰鬥力。

湘軍軍餉由將帥自籌自支，又使湘軍的持續發展獲得了相對獨立的經濟基礎。湘軍還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後勤補給系統，並通過左宗棠、駱秉章、胡林翼等人的努力，把湘鄂兩省建成其穩固的後方基地，爲湘軍在長江中下游地區與太平軍進行多年的拉鋸戰並最終戰勝之，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援。湘軍在各場戰爭中都非常講究戰略戰術。例如：曾國藩認爲“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他排除重重干擾，甚至違抗清廷命令，堅持其集中力量爭奪長江中游的武漢、九江，然後再圖安慶，最後圍困天京的戰略。左宗棠收復新疆，實行緩進急戰，先北後南的戰略，也是善於根據客觀情況制定正確戰略的例證。此外，湘軍集團還重視從實戰中總結戰術，例如：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水師與陸營協同作戰、圍城打援、以靜制動等戰術，既爲湘軍積累了有益的經驗，也爲後世的軍隊建設提供了借鑒。這些都是湘軍在軍事上取得成功的內在原因。

（二）作爲政治集團

湘軍在晚清政治史上，也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作爲一個政治集團，湘軍與歷史上其他士大夫政治派別一樣，也沒有統一組織機構和條規，更談不上組織紀律，而是

① 曾國藩：《營規》，《曾國藩全集·雜著》，岳麓書社，1994，頁463。

② 曾國藩：《與張亮基》，《曾國藩全集·書信》，岳麓書社，1994，頁208。

由信仰相同、思想相通、利益攸關、地域相近、社會關係密切相聯的一批人物在長期合作過程中逐步形成的。^① 曾國藩在創建湘軍過程中，因為籌餉事宜及與地方官員的協調工作多有不順，逐漸認識到只有掌握地方政權才能領軍作戰，因此竭力為本集團的人員及自己謀求最大的政治地位和權利，每逢戰勝，就大量保舉屬下和幕僚擔任各級政府官員。而被太平軍佔領地區經湘軍收復之後，由湘軍集團來進行管理和統治，也是勢所必然的。隨着湘軍取得對太平軍作戰的一系列戰功，湘軍人物就沿着戰線的鋪開而逐漸佔據了大量的地方實缺職務，湘軍在政治上的權力和影響力也就逐漸擴大，因而逐漸形成為一個政治集團。

湘軍作為政治集團，其發展過程中始終面臨一個難題，即調整與滿洲貴族政治勢力的關係，與之和諧共處。以滿族貴族為主體的清廷對湘軍集團的心態十分複雜，一方面不願意看到湘軍集團變得強大，對湘軍多有猜忌；另一方面，在危難的關頭却又不得不依賴湘軍集團，重用湘軍人物。清廷最初對湘軍集團採取既使用又限制的政策，對曾國藩多方掣肘，使之難以任事。隨着八旗與綠營軍隊的潰敗，特別是江南大營的潰散，清廷可以依靠的軍事力量就只有湘軍了。在這種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放手使用湘軍，甚至在政治上配合、扶助湘軍集團，使湘軍集團政治勢力急遽膨脹起來。這從湘軍集團人物擔任地方督撫與其他中高級地方官員的人數和地域分佈上，可以得到證明。咸豐十年（1860）夏至同治三年（1864）夏，先後有二十三名湘軍人物擔任督撫。同治三年（1864），同時任總督者有曾國藩、左宗棠、劉長佑、毛鴻賓、駱秉章、楊載福六人，而清朝的總督總共才八位（河督、漕督不計）；擔任巡撫的多至八人，而清朝總共設有十五位巡撫。兩江總督一職是大清帝國最重要的地方官位，因為其所管轄的東南地區是清帝國財政稅賦的最主要來源。這個顯赫的職務在晚清四十年間，均由湘軍將帥或與湘軍有關的重臣擔任，足見清王朝對湘軍的依賴程度之深。在湘軍集團鼎盛時期，控制了湖南、湖北、四川、江西、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陝西、山東、直隸等十三省，長江天險也完全由湘軍水師駕馭。這時的督撫與清朝前、中期相比，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力，軍隊是他們自募自練自統，軍餉是自籌自支，捐稅是自徵自用，新設立部門及各府縣，甚至道的官員，都可自由任命，藩司臬司的任免也多受督撫左右。湘軍集團佔有如此廣大的地盤和勢力，不僅在清代是空前的，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②。這些都說明湘軍政治集團，已經擁有與滿洲貴族相抗衡的政治力量，甚至還有凌駕而上之勢。但以曾國藩為核心的湘軍領袖，大都從小飽受理學的熏陶，能夠恪守君臣之義，雖然偶有對朝廷的不滿情緒，但終歸不會越出其作為臣子的本分。這樣就有效地調整了漢族地主與滿族貴族的關係，為清王朝的統治機器注入了新的活力，維護了清朝政權的中興局面。

① 龍運盛：《湘軍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頁289。

② 龍運盛：《湘軍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頁289。